

从“掩鼻过”到“乐枕河”：北京一条河的十年之变

三探京南凉水河

本报记者乌梦达、黄海波、田晨旭、李春宇

北京凉水河，开凿于隋代，干流起自北京市石景山区，流经海淀区、西城区、丰台区、大兴区、朝阳区，最终于通州区汇入京杭大运河。淌过千年岁月，它是北京南部的重要河流之一。

古时的凉水河，源头为地下泉水，因水温较低故而得名，有悠久的历史积淀。

“凉水河边路，依稀似故乡。野亭穿径窄，溪柳夹川长。”明代诗人邵经邦的《游凉水河》一诗，为人们描绘了数百年前凉水河的优美景色。

在历史上，这条穿越北京的河流，曾发挥过运输、排水、灌溉等诸多作用。

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流域人口高达450万人的凉水河，一度污浊返臭、市民避之唯恐不及。2013年起，北京市连续实施三个“三年治污行动”，启动凉水河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

十年来，新华社记者持续追踪凉水河治理过程，先后播发《疲惫的河流——北京凉水河调查》《复苏的河流——北京凉水河再调查》，通过解剖一条河道治理的“麻雀”，记录凉水河从疲惫到复苏，从沉寂到生机的历程。

2022年初秋，记者再次走访凉水河全线。生态、民生、文化……河道内外的种种变迁，见证这条千年河流重现昔日风采。

梦想成真的枕河生活

凉水河两岸正呈现出一幅“水清、岸绿、安全、宜人”的水域画卷，实现了市民对于枕河生活的美好想象

公静波是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荣华街道卡尔百丽社区的党委书记。2004年，她搬到了凉水河畔的荣华街道居住。那时的凉水河还是气味刺鼻、难以靠近的“臭水河”，常见市民掩鼻匆匆而过。

“那时在河边居住的群众总来居委会反映情况，都说夜里完全没法开窗户，真是睡觉都能熏醒了。”

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居住在凉水河边的北京市民，忘记了这条南城水系“动脉”本来的名字，脱口而出就是“臭水河”。

北京市民王先生2008年搬到右安门街道一处新开发的商品房小区，紧挨着凉水河。“开发商宣传这是南二环边上难得的水岸楼盘，我们入住之后就有些后悔，夏天河水味儿太大不敢开窗，纱窗上总是黑乎乎地停着一层蚊虫。”王先生回忆。

北京市凉水河管理处小红门管理所所长常松介绍，凉水河由于流域人口增长过快，污水处理设施跟不上，大量工业、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道中，对生态系统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在2000年前后，凉水河水质已达到劣Ⅴ类。周围居民不堪其扰，家里窗户都不敢开。”

截流污水、整修河堤、疏通河道……随着治理工作启动，凉水河悄悄地发生了变化。

河水变得清澈，枕河人家的心情也跟着透亮。王先生心心念念的水岸生活越来越名副其实，“这水真不臭了！站在小区高处看凉水河，别说还真有点小长江的感觉”。

初秋时节，微风徐徐。记者沿凉水河岸自西向东而行，一路感受着城市与自然交织的风光。

曾深受黑臭水体困扰的凉水河经开区段，因良好的生态环境于2020年成功入选全国首批“示范河湖”。在河边骑行的市民黄先生表达着内心的喜悦：“我在北京市经开区已经住了十几年，每天都要来凉水河边骑行一个小时，看看两岸的花花草草。但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一条臭水沟，根本就无法靠近。”

他告诉记者，现在的凉水河，一大早便有附近居民甩鞭、遛弯、垂钓。跑步、骑行的人也不在



少数，甚至有不少来自北京怀柔、密云等北部地区的骑行队过来打卡。

如今的凉水河畔，由服务通道、坡面栈道、过河汀步组成的亲水慢行系统，拉近了人们与自然的距离；路灯、鸟笼架、驱蚊灯、坐凳、垃圾桶与钓鱼平台，则进一步满足着人们的亲水需求。十年间，凉水河两岸正呈现出一幅“水清、岸绿、安全、宜人”的水域画卷，实现了市民对于枕河生活的美好想象。

逐渐擦亮的生态底色

岁月轮回带给我们如何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启示。如今，水净树绿的古韵景观正在回归

历史上，凉水河两岸景色十分优美。在元时，官宦争相在凉水河上游建设园林别墅。《帝京景物略》载：“草桥去丰台十里，中多亭馆，亭馆多于水频圃中。而元廉希宪之万柳堂，赵参谋之鲍瓜亭，栗院使之玩芳亭，要在弥望。”

河水千年流淌，从曾经的江南风光到疲惫不堪，再到重新复苏，岁月轮回带给我们如何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启示。如今，水净树绿的古韵景观正在回归。

数据显示，凉水河水质从劣Ⅴ类改善到现在的Ⅳ类，一些河段达到了Ⅲ类，两岸绿化则增至287万平方米。

十年间，水清岸绿，生态底色逐渐被擦亮。顺着河道放眼望去，绿植与河水装点的滨河步道串联起上下游，成为跑步爱好者打卡的线路。

凉水河还清，欢喜的除了两岸居民，还有大自然的“朋友们”。近年来，凉水河渐渐化身为水



鸟的乐园，大批野鸭、白鹭等鸟类栖息，河道内也出现了鱼虾。2021年2月14日，疣鼻天鹅首次现身凉水河经开区段，一时间成为当地群众热议的美食。

水鸟对湿地生态环境十分敏感，它们的到来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一个湿地生态环境的改善。常松介绍，2021年1月，北京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中心在凉水河亦庄段进行冬季鸟类调查，结果显示，从亦庄凉水河公园到通州区新河村，长度10公里的河道内，共生活43种鸟类，其中水鸟23种，数量最多的是野鸭和小鸊鷉，各有1000余只。

“现在凉水河经常能看到各类水鸟，我们有学生组成的‘观鸟之友’团队，也有亲子观鸟团。他们会定期组织观鸟活动，有家长给孩子介绍鸟类的，也有举着相机给水鸟拍照的，可热闹了！”公静波说。

“我们希望在将来将凉水河建成集防洪、景观、生态、人文于一体的多元化城市河道，让它成为都市内的绿色亲水空间。”常松说。

河道治理的十年攻坚

治水先治岸，治污先治源。一亩泉湿地之下，“暗藏”着小龙河，乃至凉水河还清的一大“功臣”

顺着凉水河的支流——小龙河溯源。几年前记者探访时，这里的河道内几乎被垃圾和废弃物堆满，墨绿色的水面漂浮着塑料瓶，“镶嵌”在水上如同冷却后凝固的油脂，散发着恶臭。如今，这里恶臭不再。



沿着河道，记者来到一座名为一亩泉的湿地。这是一片流水潺潺、绿意盎然、水鸟翔集的生态乐园。而在这片湿地之下，“暗藏”着小龙河，乃至凉水河还清的一大“功臣”——北京排水集团槐房再生水厂。

“我们厂地处小龙河源头，其产出的再生水是小龙河重要的水源之一。水厂主要处理北京市西南城区的生活污水，处理后的主要出水指标达到地表Ⅳ类标准，对还清小龙河、改善凉水河水质发挥了重大环境效益。”北京排水集团槐房再生水厂厂长卓崑说。

治水先治岸，治污先治源。常松介绍，凉水河污染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流域内污水处理能力的不足。为此，北京市水务部门于2013年启动“三年治污行动”，重中之重便是提升污水处理能力。

水脏，问题在水，根子在岸。对流域内86处规模以上的排污口进行治理，全面取缔排污口；新建污水管线、再生水管线，改造雨污合流管线，提高污水收集能力；在流域内升级改造或新建污水处理厂和再生水厂，提升污水处理能力……目前，凉水河流域实现了污水全收集全处理，杜绝污水入河，再生水也成为河流的重要水源。

记者沿着凉水河，走入北京市经开区的亦庄新城滨河公园，茂密的植被阻隔了城市的喧嚣，河堤步道旁的柳树随风摇曳着枝条。不远处，凉水河上嬉戏水鸟不时扇动翅膀，在水面上掀起层层涟漪……

河道还清，还离不开一群守护者。

在凉水河边居住了18年的公静波，见证着凉水河的变迁，更感慨于凉水河还清的不易。2021年，公静波成为一名民间河长，

承担起巡查河道、保护河湖的重要职责。

2017年，北京市正式建立市、区、乡镇（街道）、村四级河（湖）长体系，每条河道都有了自己的“巡护人”。结合河长制与智慧监测系统，凉水河治理工作得以进一步精细化，更多环境死角与细微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有效阻止了污染问题的反弹。

水润京华的美好愿景

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河流会如何？属于城市与河流未来的答卷，还在继续书写

凉水河由污转清的艰辛历程，不仅是一条河流的传记，也是北京市水生态环境变迁的缩影。

“永定河，出西山，碧水环绕北京湾。”历史上，被称为北京母亲河的永定河裹挟着自上游冲刷而来的泥沙，在下游沉积形成了北京小平原。而依水而建、因水而兴的北京城，也曾是一座泉源遍地、河流纵横的城市。

然而，随着城市发展、人口增加以及气候变化等因素，北京部分河湖水库日渐枯竭，地下水位呈加速下降趋势，以凉水河为代表的河道开始出现严重污染问题……

水是生存之本，更是文明之源。因水而兴的城市，绝不能因水而败。

如同在凉水河开展的治污工作，2013年起，北京市连续实施三个“三年治污行动”。曾因蚊子成群被称为“蚊子河”的新凤河，如今因为清澈见底成了“清水河”；曾因恶臭、颜色浑浊被称为“牛奶河”的萧太后河，如今也成了生态河……全市污水收集处理率从2013年的83%提高到95.8%，劣Ⅴ类水体全面消除。全市142条黑臭水体全部清零，1000多条小微水体全部完成治理并持续巩固。

在解决河流污染问题的同时，北京市还对永定河、潮白河在内的多条河流进行生态修复，调度外调水、本地地表水、再生水、雨洪水等多种水源进行生态补水，生态效益逐步显现。

据北京市水务局介绍，在有利气象条件和精细化调水共同推动下，到2021年12月，北京市有水河流166条，有水河长3469.74公里，有水水面面积为448.29平方公里。有水河长增加786.3公里，有水水面面积增加71.48平方公里。

“感觉这些年北京的河湖水多了，环境变好了，亲水的项目也越来越多。”在记者沿凉水河走访的过程中，不少民众表达着相似的观点。近年来，北京市水务部门依托复苏的河湖，不断开放共享河湖岸线空间，规划皮划艇区域、开辟河湖大众冰场、打造亮马河、京杭大运河等游船线路，沉寂多年的水域空间逐渐变得热闹起来。伴随着大运河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建设，河湖的文化属性也被激活，日益为人们津津乐道、口口相传。

记者从北京市水务局了解到，北京市水务部门将于今年制定并组织实施第4个三年治污行动，继续提升全市水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改善河湖生态环境，让更多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惠及人民。

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河流会如何？新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勾勒出这样一幅蓝图：到2035年北京全市城乡污水基本实现全处理，全市再生水利用率达到70%以上，全面实现污泥无害化处置，逐步恢复水生态系统功能，成为天蓝、水清、森林环绕的生态城市。

夕阳西下，记者站在北京市通州区榆林庄闸附近的岸边，眺望凉水河奔涌的河水不断汇入京杭大运河。碧波汤汤，奔流不息。属于城市与河流未来的答卷，还在继续书写。

（上接9版）13次采访下来，先生的身体状态也每况愈下，这让范瑞婷和同事们非常揪心。2018年，《一生一事》即将付梓，田苗他们拿着粉、白、黄三种色调的封面设计，给病床上的顾先生看，老人当时表述已有困难，但他还是指着白色的方案说：“选白色吧，我这一生清清白白。”

2019年1月2日，顾先生走了。得知消息的时候，范瑞婷正在阳台上晾衣服。她扔下手里的活儿，第一时间打给顾先生的老伴李以莞奶奶，本来想安慰老人，却在电话接通的一刻，哭得说不出话来。顾先生走了，他的故事和精神却在范瑞婷“身上”留下了痕迹。“我常常会想起他，尤其做母亲之后，我每次带孩子打疫苗，都会记起先生让自己的孩子试吃糖丸的故事，越想越觉得震撼。”

范瑞婷觉得，“中国记忆”这份工作的价值就在于此，“做口述史是特别一个正能量的工作，我们的采访对象所做的事，他们的品质，都让我由衷地仰慕，想要去学习、去追随，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职业红利’”。

作为“中国记忆”团队里相对年长的成员，李东晖今年刚刚整理出版了《予知识以殿堂：国家图书馆馆舍建设（1975—1987）口述史》。为了这本书，她采访了20多位参与国图总馆南区建设的设计师、工程师、老馆员。“他们不只是国图历史的亲历者，更是缔造者。我作为一个2007年进入国图的晚辈，能通过这项工作，把自己和学识渊博的前辈、和国图的命运连接在

一起，真的有种幸福感。”说这话的时候，李东晖笑得像个孩子。

杨秋濛为几十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国纪录片普及及发展的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司徒兆敦先生做过4年的口述记录。每次采访，她会提前做出至少三次的采访提纲，并查找各种资料，给每个问题列出一个“参考答案”。司徒先生有时会惊讶于这个年轻人准备之充分，问她：“我手头都没有的照片，你怎么找到的？”二人成了忘年交。杨秋濛同时负责东北抗联纪录影片的策划与创作工作，有时思路“卡死”，她会向司徒先生“求援”，先生的指点总给她一种拨开云雾的感觉。“这样一位有成就的行业前辈，愿意和我分享一辈子沉淀的经验和人生智慧，我觉得特别荣幸。”

因为看重这份“职业红利”而加入“中国记忆”的成员还有谢忠军。他是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方向的硕士，对非遗项目怀有一腔执着的热情，但毕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没能从事和专业相关的职业，这在他心里是种遗憾。“所以后来，忠军放弃了公务员的‘铁饭碗’，辞职加入‘中国记忆’。”介绍到谢忠军，田苗的语气里带着感慨。谢忠军倒很平静：“我就是觉得现在这份工作能够学以致用，很符合我的志趣。”因为主要负责传统技艺类非遗项目相关的工作，他对中国传统酿造、制瓷技艺和其中蕴含的科学原理都颇有研究；他给中国第一代科幻小说作家、地质学教授刘兴诗做

过口述史记录，也采访过冰川、气候学家秦大河院士，每采访一位，他都要求自己尽可能多地阅读受访者的著作。“这些著作，这些科学家的讲述对我个人也是一种滋养。”谢忠军很喜欢他现在的工作，他的投入和专业也让受访者对“中国记忆”报以更大的信任。“有一次采访，秦大河先生突然问我，我插在南极点的国旗、科考时的睡袋还有日记，你们国图能收吗？”

按照田苗的理论，“只有好人才能做口述史”，那这样意外而珍贵的收获，大概就是“好人有好报”的结果。

“技·忆”

在拉大车的“小马”之中，刘芯会身上的担子有些不同，用田苗的话说，她是全能型人才。这位国际法专业的高材生语速不慢，但逻辑清晰。她负责的口述史采访对象，是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原所长王世仁先生。不用借助任何参考材料，刘芯会就能清楚准确地复述这位88岁文物古迹保护专家的人生履历：哪一年考入清华大学营建学系（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前身）；哪一年到清华大学建筑科学研究院工作，从梁思成先生的学生变成与先生共事的晚辈；哪一年主持了北京湖广会馆的整修，又在哪一年参与了北京司马台长城的修缮……

等话题转到她“身上”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中国记忆”大量口述文献资源的后期编目、保存和管理，她又能迅速切换频道，用一套“硬核”的科技术语，给记者解释对影音文献等口述记录产生的全文献类型，应该遵从怎样的规范、用什么样的软件来进行编目；适用于影音文献编目的媒资系统，要和便于公众搜索、浏览的专题网站联结在一起，又有哪些技术上的障碍。

这一部分，让记者听得有些吃力。田苗坦言，这也是让他们感到“吃力”的一大难关。“中国记忆”走过十年，团队成员走出图书馆，创造了大量的新型文献资源。但受限于资金和技术，对这些文献的保管和“再加工”还没有跟上，田苗和同事们梦想中方便公众随时调阅、查看的平台还停留在建设阶段。

人手不足是另一道关。“我的理想是很丰满的。干我们这些事儿，目前这些人手是远远不够的。”田苗的理想不仅丰满，还很具体，“国图的中国记忆中心需要有资源建设、加工、编目、推广等几个方面的团队，大概需要150人到200人，每个省的图书馆再成立一个分中心，各个行业和学科要做各自的记忆……”

短期内，这样的目标显然难以实现。尽管“特别有激情、特别能战斗”，但靠这十几个人组成的团队，想要跑赢时间，抢救更多有价值的历史记录，还是会“力不从心”的时候。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中国记忆·学者口述史”专题的受访者名单已经许久没有扩充过。他们知道，现有的采访对象覆盖面还有局限，人文社科类的偏多，理工类的较少。“这和我们的知识背景、线索收集渠道等都有很大关系。”但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人手不足”。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中国记忆”一直在想办法。从2017年起，田苗和同伴们挤出时间着手开发一款应用，一旦技术成熟，它将成为我国第一款面向公众的口述历史采访应用。通过它，每一个“普通的好人”都能成为口述史的访问者，留住身边的“中国记忆”。

谈起未来，田苗和同伴们依然乐观，期待着能有越来越多志同道合的人加入“中国记忆”队伍，让“小马”渐渐长成“大马”；也盼着技术发展能给他们的工作带来更多助力。但眼下，走过十年的“中国记忆”团队还是会快马加鞭，继续奔跑在抢救记忆的路上。

近几年，“中国记忆”每年都会举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成果展映月”。他们为其设定的主题是“年华易老，技艺永存”——用口述历史留下技艺也留下记忆。田苗觉得，他们现在的工作也是在平衡这两个字。“不管有多少困难，我们先行动起来，把一部分最濒危的记忆保住，等着技术跟上。千万别等到将来，技术有了，记忆却没了。”